



国家治理视阈下

中越边民通婚问题研究

——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纪洪江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导 论	(1)
一、本书写作由来及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8)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33)
四、本书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35)
第一章 中越边境生境与中越边民通婚	(37)
一、中越边境生境	(37)
二、中越关系变迁	(45)
三、中越边民通婚	(56)
本章小结	(64)
第二章 中越边民通婚解构	(65)
一、中越边民通婚的演进	(66)
二、中越边民通婚的特征	(71)
三、中越边民通婚的途径	(96)
四、中越边民通婚的模式	(102)
本章小结	(107)



第三章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	(108)
一、中越边民通婚的生成逻辑	(109)
二、中越边民通婚的个案调查	(134)
三、中越边民通婚的“他者”视角	(142)
本章小结	(154)
第四章 中越边民通婚的社会功能	(155)
一、中越边民通婚的社会正功能	(157)
二、中越边民通婚的社会负功能	(160)
三、中越边民通婚：他者认同与制度排斥	(199)
本章小结	(203)
第五章 中越边民通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204)
一、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的理论思考	(205)
二、中越边民通婚合法化的制度困境	(217)
三、国（境）外婚姻移民政策及启示	(227)
四、中越边民通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242)
本章小结	(269)
结 语	(270)
后 记	(275)
参考文献	(278)
附录 1 调查问卷（越南籍配偶）	(299)
附录 2 调查问卷（中国籍配偶）	(306)
附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311)
附录 4 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	(314)

附录 5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318)
附录 6	云南省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管理规定·····	(325)
附录 7	德宏州边民入境通婚备案登记管理规定 (试行)·····	(332)
附录 8	董干边防派出所境外人员管理措施·····	(337)
附录 9	田野调查照片·····	(339)
致 谢	·····	(355)

导 论

一、本书写作由来及意义

（一）写作缘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在 2014 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形象的提升，中国在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逐步成为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据联合国估计，2013 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 84.85 万人，近十多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3.9%，比 1990 年至 2000 年的 3.0% 有所提高。

交往机会和文化认同程度是跨国婚姻形成和发展的两个最基本因素，而交往机会的多寡受空间距离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程度的制约。^①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人们的交往机会日益增多，人们对异文化的了解、认可和包容程度越来越高，跨国婚姻现象也日渐增多和普遍。可以说，一部世界

^① 丁金宏、杨鸿燕、周少云、周吉祥、林克武、张玉枝：《论新时期中国涉外婚姻的特征与走向——以上海为例》，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 年第 3 期。



经济的开放发展史，就是一部跨国婚姻的增长及内涵演变史。全球化给婚姻家庭带来了剧烈变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塞姆在二人合著的《全球热恋：全球化时代的爱情与家庭》中甚至提出了“世界家庭”的概念，来涵盖如今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跨越遥远距离和文化鸿沟的跨国婚姻。^①

国际移民与政治、经济、法律、安全、发展、伦理等问题密切相关且又相互作用。当代国际移民，无论是全球性迁移还是区域性迁移，其政治效应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所言，当代国际移民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存的发展趋势。^②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性移民现象，中越边境边民通婚因其特殊的边民和跨境民族身份，以及特殊的边疆地理位置因素，其政治效应更为复杂。首先，世世代代身居边境的两国边民，因特殊的地域、历史、文化、经济、民族等因素的影响，边民跨境通婚现象自古便已有之且极为普遍。“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境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在传统小社会中，跨境婚姻具有‘自然天成’的特征。”^③但是，受中越两国的法律规定、边民自身经济能力和文化水平等的限制，中越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德]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塞姆：《全球热恋：全球化时代的爱情与家庭》，樊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世界家庭”指的是“居住在或来自不同大洲、国家的人构成的爱情与亲属关系”。

^② [英]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

^③ 保跃平：《跨境婚姻行为选择的主体性特征及制度困境——以云南边境地区为例》，载《南方人口》，2013年第4期。

边境边民的跨境婚姻很难获得我国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绝大部分沦为非法“事实婚姻”。其次，进入我国通婚的越南边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主权国家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严重冲击着我国作为主权国家独立保护捍卫边界的能力和权威，使得中越边境边民非法通婚问题日益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再次，“移民后时代”的社会融入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但中越边境地区嫁入我国的越南妇女却因婚姻未登记、户籍国籍身份缺失而游离于国家的各项扶贫措施之外，融入问题遭遇诸多政策和制度困境。虽然她们的身份和行为均属非法，但不得不承认，她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婚姻移民。她们的普遍存在，无疑给我国边境的社会稳定和边疆治理带来了难题和挑战。如果放任不理，或处理不好，一方面，在国内对边境稳定发展及和谐边疆建设是一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对中越两国关系以及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也是有害无益。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认为，随着大量外籍人士进入中国，其在为繁荣经济、促进中国国际化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社会稳定以及安全环境带来了挑战。我国虽然还不算发达国家，但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贫穷国家的移民将进入我国。正视包括进入我国的越南通婚边民在内的国际移民带来的挑战，从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上对外来移民及时做出相应的准备是一个以“崛起”“复兴”为目标的新兴大国未雨绸缪的理智之选。

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通婚绝大部分属于同一跨境民族之间的族内婚，但是，通婚边民不同的国家公民身份决定了边民



通婚已不再是简单的同一民族通婚，其跨国婚姻的特殊性、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特殊性，以及边境地区的特殊因素决定了在边民通婚有关问题的治理中，国家治理的核心地位及其不可替代性。然而，现实情况是，中越两国关于边民通婚的法律制度衔接不畅，造成了今天边民通婚诸多现实困境的出现。边民通婚是邻国之间睦邻友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毗邻国关系的好坏有重要影响。欲从根本上实现对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通婚相关问题的治理，现行以地方政府为主的社会治理须提升到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治理。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越边境边民通婚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同一民族相同的文化及风俗习惯、性别失衡等。结合田野调查，笔者不否认上述原因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在笔者对通婚家庭的走访中，一些越南妇女也说“两边的生活差不多”，这是否暗含着跨境民族相同的历史文化因素是促成边民通婚更为重要的动因？抑或是越南女性选择“外嫁他国”还有其他我们尚需探究的原因？而笔者收集到的现有文献中一直缺乏越南方面对边民通婚的“他者”的研究视角。对于大部分文献反映的越南妇女在婚后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社会歧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未感受到。试图探究越南女性通婚后客观、真实的社会生境也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同时，越南女性面临的婚姻关系未登记、户籍国籍缺失、权益无保障等问题也凸显了边疆的社会现实与国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的诸多制度困境。越南女性生活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对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的吁请、国家如何直面作为边境客观社会生境产物的中越边境边民通婚，并妥善解决相关问题，进而实现有序的边疆治理等

问题进一步激发了笔者探究的兴趣。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深入实施，特别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构想的实质性推进和对接，可以预见，中越边民往来将不断增加，边民通婚现象依然会呈上升趋势。跨国婚姻与其他形式的婚姻一样，它本身既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自然本能的需要。^①中越边境边民通婚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在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边疆有序治理的进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结合边民生活实际，创生并施行满足边民合理需求的各项制度，给予通婚边民及其配偶、家庭更多的人性和制度关怀，培育和激发其民族国家意识，使其积极参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边疆有序治理的历史进程，这是笔者在本书中将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二）本书的意义

人口跨境流动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正常的、合法的人口流动，既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也可以促进接收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反，人口的非法、无序流动则会给流入地的社会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经济学人》杂志认为，跨国婚姻快速增长是全球最大的社会趋势之一，而亚洲荣列全球跨国婚姻上升最稳定地区。云南省与中南半岛国家存在既亲近又复杂的地缘关系，是我国西南唯一与缅甸、老挝和越南陆上接壤的省

^① 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份，存在多个边疆跨境民族地区，边民之间跨境通婚现象较为普遍。近15年来，云南省跨境婚姻人数增加幅度年均超过10%。据云南省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共有外籍人员45908人入境与云南省居民通婚，其中缅甸籍占77.39%，越南籍占18.98%，老挝籍占3.33%，其他国籍占0.3%。在云南省16个州（市）均有分布，8个沿边州（市）有45009人，占总数的98.04%。85%属于边民通婚，在边境县中又有约88%分布在沿边乡镇。云南边境地区边民通婚现象及其带来的问题和影响，是云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及国家边疆和谐稳定构建一直面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在云南省考察工作时指出：“边防管控、非法出入境、跨国婚姻、‘跨境学童’、禁毒防艾、境外宗教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边境地区进行渗透等问题，要加强治理。”

目前国内对中越边境边民通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广西段，对云南段边民通婚的研究较少。云南本土学者对本省边民通婚的研究又主要关注中缅边境，对中越、中老边境边民通婚的研究较少。边民通婚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边民们有着与处于国家中心地带的人们许多不同的认识和行为。他们处在国家的边缘地带，普遍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他们同时又处在国家的前沿地带，承担着更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从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看，现代国家形式只要存在一天，边民通婚现象就可能一直存在。如何寻找一条既不破坏现代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又不损害边民切身利益的治理路径，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本书借鉴国内外在边民通婚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对

中越边境云南段边民通婚总体情况进行梳理、概括的基础上，选取中越边境一个有代表性的田野点的实证案例作为支撑，就中越边境边民通婚的现状、成因、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进行实证性探索和思考。笔者在大量实地调研、访谈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中越边民通婚的深层次历史和现实因素，梳理中越边民通婚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制度困境，探讨和构建既切合中越边民生活实际，又有利于国家和谐稳定、边疆有序建设的政策和举措。

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目前学术界对中越边境云南段边民通婚的研究还不多，主要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且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够；对中越边民通婚背后跨境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因素挖掘不深，尚有较大的研究和拓展空间；对越南学界在中越边民通婚领域的研究及思考，以及越南方面对中越边民通婚现象看法的“他者”视角也无人涉及。中越两国关系变迁对中越边民通婚的影响虽有提及，但无论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空间的向度上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上述领域的研究。本书还借鉴了国（境）外管理跨国婚姻的先进经验，思考《国籍法》《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衔接，为解决边民通婚衍生的有关问题提供理论参考。此外，“政策沟通”是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证。探讨中越边民通婚这一问题，增进双方对彼此边民通婚政策的了解，对于中越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云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边民通婚现象及其治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长期以



来，边民通婚因政策困境或其他现实因素积累下来的问题已成为中越边境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掣肘，也是对国家安全及稳定边疆建设的潜在威胁。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让云南实现了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末梢、“口袋底”到对外开放的前沿、“桥头堡”枢纽的巨大嬗变，云南更是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段。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中越“两廊一圈”的推进，中越边境边民通婚将更为普遍和常见。本书将尝试厘清中越边境边民通婚的成因、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产生的社会功能，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日常边民通婚治理、边境管控和边疆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同时，边民通婚问题的逐步解决将有助于增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增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促进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发展边境地区民族团结，促进两国边民“民心相通”，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对努力把云南省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本书尝试从国家治理的理念上来探寻中越边民通婚现存问题的治理路径。云南同时与老挝、缅甸接壤，与两国也存在同样的边民通婚现象。探究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通婚现象及其治理路径，无疑可为云南省解决中缅、中老边民通婚存在的问题提供极具价值的镜鉴和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边民通婚属于跨国婚姻的一种。从字面上来看，“跨国”意为超越了国界，“跨国婚姻”指两个不同国籍的人结成的

婚姻关系，或是同一国家的人在异国建立的婚姻关系。跨国婚姻是一个宏观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表述，如“国际婚姻”“涉外婚姻”“跨界婚姻”“跨境婚姻”“跨国事实婚姻”“非法跨国婚姻”等。鉴于本书仅研究中越边境地区的边民通婚，研究成果综述将主要就边民通婚进行展开。同时，从笔者查到的文献看，目前对于边民通婚的研究，国内和国外、大陆和台湾，无论是研究的视角，还是关注的重点都有着较大的不同，下文将逐一进行综述。

（一）大陆边民通婚研究综述

在笔者搜索到的 100 多篇有关跨国婚姻的文献中，最早的出现在 1980 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居然提及了本书要探讨的云南边民通婚。^① 2005 年以来，有关边民通婚的研究开始增多。从文献资料可以发现，跨国婚姻的研究重点已逐步转移到边境地区的边民通婚现象上，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国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综观大陆对边民通婚的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边民通婚的发展趋势

现有文献中，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无论是在开放及发达程度较高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福建等，还是在边

^① 《瑞丽县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瑞丽小组”》，载《华夏人文地理》，1980 年第 1 期。“瑞丽县坐落在祖国西南边陲，全县人口六万二千多，傣、景颇、傈僳、崩龙等少数民族占一半以上，三面与缅甸接壤，境内外边民同属一个民族跨界而居，通婚互市。”



境地区，国内跨国婚姻的数量都呈增长趋势。^①当然，也有分析认为，跨国婚姻在经历初期的快速增长后，近年开始趋于减少。^②笔者认为，在国内经济发达且开放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跨国婚姻登记数在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增长后出现下降，反映出人们对跨国婚姻的选择及看法正趋向理性。而在边境地区，特别是中国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地区，随着国家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边民通婚现象呈扩大趋势。

2. 边民通婚的动机及成因

很多文献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边民通婚形成的动机和原因。概括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关系及政策影响是边民通婚形成和增长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背景。^③“跨国婚姻的增长变化与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经济开放为婚姻开放提供了条件”，“参与涉外婚姻的人婚姻观念开放，在比较利益驱动下，更愿意抛弃自己原先

^① 丁金宏、杨鸿燕、周少云、周吉祥、林克武、张玉枝：《论新时期中国涉外婚姻的特征与走向——以上海为例》，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3期。周杏开：《广东省的涉外婚姻》，载《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叶文振、林擎国：《福建省涉外婚姻状况研究》，载《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2期。张国钦：《桂林市涉外婚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载《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4期。全信子：《中国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以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为研究个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7页。王晓燕：《中缅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8页。

^② “据中国民政部网站刊登的历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近10年来，中国涉外婚姻在2003年曾出现一个高峰，此后几年内，涉外婚姻登记的数量开始趋于减少。”参见郗新蕊、杨凯淇：《专家：中外跨国婚姻渐趋理性 文化差异并非障碍》，<http://www.chinanews.com/hr/2011/04-19/2982448.shtml>。访问时间：2015年5月8日。

^③ 李雪岩、龙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妇女篇）——以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为例》，载《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

的家庭投入新的跨国、跨境婚姻。”^① 第二，通婚双方所属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差距是边民通婚形成的主要动因。“边境两侧发展差距构成跨国婚姻的‘推拉’合力。在跨境民族地区，中国相对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构成邻国女子嫁入中国的拉力；而邻国贫困与落后构成该国女子嫁入中国的推力，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牵引着境外女性的婚姻选择。”^②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一方寄望于通过婚姻实现自己命运的改变，甚至整个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一点在初期大城市的跨国婚姻以及现在边境地区的边民通婚现象中体现得极其明显。^③ 第三，婚姻市场中人口性别比例失衡

① 丁金宏、杨鸿燕、周少云、周吉祥、林克武、张玉枝：《论新时期中国涉外婚姻的特征与走向——以上海为例》，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3期。

② 保跃平：《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③ 叶钦地：《福州涉外婚姻初探》，载《福州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陆斌、潘清、季明：《上海涉外婚姻的变迁》，载《记者观察》（上半月），2003年第8期。何明：《文化认同、理性选择与民族国家——中越、中缅傣泰边民跨国婚姻的调查与分析》，载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成果报告书》，2010年，第90页。罗文青：《和平与交往：广西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初探》，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李雪岩、龙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妇女篇）——以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为例》，载《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王晓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动机和社会影响》，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白志红、李喜景：《中缅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对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影响分析——以云南省龙陵县徐家寨为例》，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杨文英：《中缅边境跨国婚姻现状分析——以云南省保山市为例》，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全信子：《中国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以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为研究个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7页。



是边民通婚形成的重要客观因素。^①有的学者认为,“性别比失调引发的‘婚姻挤压’现象是边民通婚形成的深层次社会动因”^②。第四,认同是边民通婚形成和发展的主观诱因。双方在国家、历史、文化、宗教、地域等方面的认同是边民通婚的重要基础,西南边境的苗族、壮族、傣族等民族的边民通婚以及东北朝鲜族的跨国婚姻背后强烈的民族认同即是佐证。^③第五,对于边境地区的边民通婚现象,一些学者认为,地缘条件、边民互市等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越南妇女和中国男子在选择婚配对象时,并不会过多地考虑对方是否傣族,跨国通婚主要取决于男女双方在互市点结交的机会。”^④

3. 边民通婚的形成途径

婚姻双方成婚前一般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常见的方式不外乎自由恋爱、亲戚朋友介绍和婚姻中介介绍等。边民通

^① 罗文青:《和平与交往:广西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初探》,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孟立君:《广西边境地区非法跨国婚姻产生的原因及对策》,载《武警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王晓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动机和社会影响》,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李雪岩、龙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妇女篇)——以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为例》,载《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王晓燕:《中缅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84页。

^② 保跃平:《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③ 罗柳宁:《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兼论“无国籍女人”的身份》,载《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全信子:《关于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基本模式的探讨——以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为个案研究》,载《东疆学刊》,2007年第4期。全信子:《中国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研究——以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为研究个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7页。

^④ 谷家荣:《边民生活政治:中越跨境民族的记忆、心境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婚中的男女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其认识途径主要是自己认识和亲戚朋友介绍。中日、中韩之间的跨国婚姻已形成婚姻市场，大部分以婚姻中介介绍为主。学者们多以改革开放后人们多元化的婚姻价值观变化解释上述跨国婚姻的形成途径。对于西南边境中越、中老、中缅的边民通婚，因通婚双方多属于跨境少数民族，具有天然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日常交往频繁，自由恋爱和亲戚朋友介绍成为边民通婚的主要途径。也有学者把外籍媳妇的“中介效应”作为边民通婚的途径之一。^①在笔者看来，外籍媳妇的“中介效应”其实也属于亲戚朋友介绍的一种特殊情况。

4. 边民通婚面临的问题

从跨国婚姻的登记来看，跨国婚姻可分为合法婚姻和非法事实婚姻两类。我国相关法律均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但是，对于边境地区，特别是中越、中老、中缅之间的边民通婚，因诸多原因大部分并未登记，属非法婚姻。对于这类婚姻，有的学者认为：“其中有些婚姻是符合我国事实婚姻的情形，因而应为有效婚姻。”^②

对于主要发生于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的非法跨国事实婚姻，因通婚的主体为跨境少数民族，双方的跨境民族身份和居住在边境地域的特殊性，会带来其他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和影响，即边民通婚的问题与跨境民族和边境管理的问题

^① 王晓燕：《中缅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12页。

^② 覃晚萍：《对中越跨国婚姻的法社会学思考》，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1期。